

和合学

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下卷)

张立文 著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heory
Culture Strategy Thinking for 21st Century

和合学

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下卷)

张立文 著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heory
Culture Strategy Thinking for 21st Centur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合学：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张立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6

ISBN 978-7-300-22799-3

I. ①和…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899 号

和合学

——21 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

张立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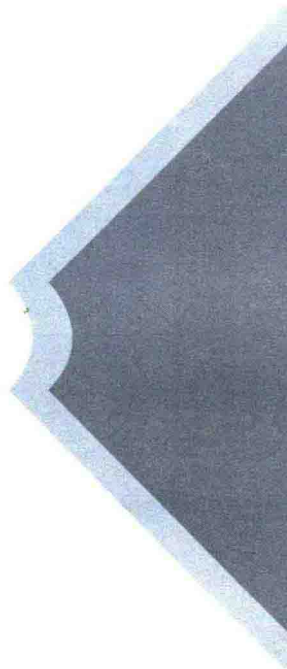
Hehe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51.25 插页 4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56 000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下 卷



第十一章 和合学原理之用

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人与自然的冲突和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和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和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和精神危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和价值危机）的挑战；二是西方文化的挑战；三是现代化的挑战。化解此三大挑战的文化方式和价值合理性的选择，便是和合学^①。

一、从战略构想到战略预测

融突而和合，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具有巨大的魅力；对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内驱的动力。

（一）现代三大挑战的回应

中国在三方面挑战下，如何做出化解？曾经历了痛苦而悲壮的历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中西非体非用”等，这是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的；就如何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具体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等；就传统文化如何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理解，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等；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论，返本开新论等，莫衷一是。但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人们出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对此亦十分热心和关注，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和怎样走向或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总觉得未能落到实处之嫌。

为什么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如何和怎样走向或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说到底其背后是价值观的问题，即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等。譬如：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什么？中学或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或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何以为新？彻底决裂什么和为什么？什么为全盘西化？能否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当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它不仅是从人对待满足人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而且标志着主体的需要和外物的关系。这就是说，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① 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② 价值评价是指人在评价活动中所确定并应用于评价对象的评价尺度和界限。人在价值评价中，一般是通过对“应然”与“实然”的比较，而做出“应该”与“不应该”、“应当”与“不应当”的选择。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是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表现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

^① 参见拙著：《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352~353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② 参见李德顺：《价值论》，2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是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是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是”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

价值评价标准受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制约。这就是说，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该”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该”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时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宋明理学家朱熹、王阳明都以“灭人欲”是应该肯定的、有价值的；戴震却认为“体情遂欲”，情欲是应该肯定的、有价值的，否定并批判“灭人欲”。同时，朱、王又认为“存天理”是应该肯定的、最有价值的精华；戴震却认为是“以理杀人”，天理是应该批判的，只有负价值。^①

这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该否定什么、继承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创什么新、弃什么旧等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和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相似之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以及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曾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亦遇到应当容什么、蓄什么与不应当容什么、蓄什么等的价值评价问题。因此，在 400 多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做出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原道》）的肤浅而简单化的做法，反衬出在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的儒学的危机。

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的方法，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

^① 参见拙著：《宋明理学研究》，第五章《朱子学——朱熹的道学思想》、第七章《阳明学——王守仁的心学思想》；《朱熹思想研究》；《戴震》。

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儒辱》）

孙氏重在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在君臣、父子、夫妇以及仁义礼乐等方面的破坏、失序和危机。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佛、道。他说：“缙黄存则其害有十，缙黄去则其利有十。”^①所谓“十害”，是指男女不知耕蚕，男旷女怨，坐逃徭役，民财殫、国用耗，亲老莫养，跨山据田，岁营缮而夺农时，市价腾涌，器用华而门堂伤，惰子吏猾以庸役等。“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乐业，国家富强，万世之策也。”^②但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或融合儒、释、道。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手段和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回答了容什么、蓄什么问题，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

宋代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做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包括道教）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用现代的话说，即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尽管当时的统治集团以及一些人并不理解这一点，甚至到了南宋朱熹时亦未被理解，而把朱熹和与朱熹志同道合者以及程朱学派打成“伪学”，“逆党”，并订立《伪学逆党籍》。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已绝伪学”（《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流放朱熹的高足蔡元定，蔡死于流放途中。朱熹死后的送葬活动，也以“妄谈时人短长”和“谬议时政得失”^④，受到监视和限制^⑤。宋理宗时，才逐渐理解到程朱思想的价值，程朱理学才慢慢被奉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挑战的内涵、性质、特征以及情境、氛围

①② 《富国策策五》，见《李觏集》卷十六，1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见《二程集》，424页。

④ 《道学崇黜》，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8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⑤ 参见拙著：《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53~54页。

等，虽与唐宋时大异，但就所面临的文化挑战的形势来看，与宋有相似之处。作为如何和怎样走向现代的方法、手段，诸如抽绎继承、选择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与兼容并蓄的方法、手段之名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手段，其实则同。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手段还可以再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应该落到实处。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做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走向 21 世纪的利益和需要。^①

（二）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 21 世纪文化发展战略的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的基点：

1.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上述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与“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文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全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中的冲突、融

^① 参见拙著：《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 21 世纪》，载《学术月刊》，1995（9）。

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待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待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等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发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待两极、在未交合之前，阴是阴，阳是阳，阴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的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现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区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力、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或经济附庸的角色，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2. 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 2000 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走过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近代演化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性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技术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3. 立足 20 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 21 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 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之上。科学技术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 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在 20 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 21 世纪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 21 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雄踞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最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 21 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 21 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三）范畴逻辑结构三定律

从逻辑结构上看^①，和合学揭示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和无限进步的内在机制。这一内在机制，是通过和合学独特的范畴系统的三大定律体现出

^① 参见拙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修订本，1~103 页。

来的。

1. 整体贯通律。^① 和合学的范畴系统，是结构与功能相互耦合，彼此贯通的和合整体。

从结构系统看功能，和合学的48组范畴都是功能高度差异化的结构单元。它们分界、分维展示和合人文精神的三个世界，八种状态，并通过一系列的转换中介，使结构单元融贯一体，生化流通。

从功能系统看结构，和合学的诸范畴又是结构高度差异化的功能单位。它们分层、分序模拟和合人文精神的六个层面，四对序偶，并通过信息的反演流行，使功能单位渐次优化，综合日新。

正是通过范畴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对偶化和合，和合学真实地再现了人文精神的“生生之道”与“日新之德”，逻辑地说明了人类文化的整体特性和贯通方式。

2. 纵横互补律。^② 和合学对文化系统自身的历史进步和彼此的交流发展，是通过范畴逻辑结构的纵横互补律来加以概括和阐述的。

第一，文化系统自身的历史进步，表现在范畴逻辑结构上，是一个纵向互补，依时序串行的和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内在的遗传机制，标志文化传统的前趋因素与体现文化创新的后继因素纵向互补，依序串行，使该文化系统的人文精神血脉相承，生生不息，构成源远流长、日新盛德的生机流行。

第二，文化系统彼此的交流发展，表现在范畴逻辑结构上，是一个横向的互补、依位序并行的和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外化的交换机制，一种文化的优质元素与另一种文化的优质元素横向互补、依序并行，使各自的人文精神遥相呼应、息息沟通，构成百川汇海、交相辉映的生意大化。

依时序串行与依位序并行，纵向的进步性互补与横向交流式互补，真实而全面地展示出人类文化的融合趋势和进步必然，说明了人文精神的和合实质。

3. 浑沌对应律。^③ 按照和合学建构的范畴系统及其逻辑结构，文化系统的可比性和差异性相对的、相关的、特征上的，文化系统的对应性和等价性是绝对的、本质上的。

① 参见拙著：《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58~60页。

② 同上书，56~58页。

③ 拙著《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称“浑沌对应律”，“浑沌”有模糊之意。

就局部状况来考察，文化系统内部具有时态化的特征，可分离出进步水平、开化程度有别的历史阶段；文化系统之间具有区位化的特征，可划分为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差异的交流类型。就整体精神而言，贯通于不同文化历史阶段的、无差别的本质是和合的民族精神；渗透在不同文化交流类型中的、无分殊的根据是和合的人类精神。它们都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等价形式，彼此之间绝无优劣之分。

和合人文精神是不同形态、不同类型文化系统的契合点。它至真无假，尽善尽美，不分优劣，无间小大，形成文化系统内部诸方面、诸阶段之间的诸类型的浑沌对应关系。其实，精神就是最浑沌的范畴。

浑沌对应律揭示了文化人文精神的对等关系和一致倾向，是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准则。根据和合学的浑沌对应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虽有时态上先后之别，中西文化虽有类型上重科技、崇道德之分，但在人文精神上无高下、优劣之辨，是浑沌对应的。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仁义道德并不比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技术文明更高明或更优越；西方的神学化伦理并不比东方的人学化伦理更美好或更超越。那种根据文化类型的特征上差异断言某种文化更高明、更优越的随意性分析，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和合精神，是对人类文化和合体的人为割裂和机械对照。

和合学范畴逻辑结构及其三大定律，将和合学的战略构想及其基本点理论化、系统化，使其深化为文化系统的内在进步机制和相互交流规律，上升为文化历史观、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比较观，成为涵摄面最广、概括度最大的跨世纪的文化价值哲学。因此，和合学顺利地实现了从战略构想经逻辑结构而达到战略预测的学术目的。

二、和合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和合学对 21 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文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一）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

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或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①整体对应、学理阶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 20 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 21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是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的危机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文明冲突，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地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上卷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1. 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① 参见拙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59～103 页。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 $(+100)\oplus(-30)\Rightarrow(+70)$ ，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第一，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不相容选择的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第二，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化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完全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其实，优劣在某种情境下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量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尺度之大小。小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流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2. 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

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己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子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知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①；《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②；《中庸》的“三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章句·第二十章》），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叠合。价值加和与意义叠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叠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叠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是依逻辑结构、构成价值和合的关键思维路线和实践途径延伸的。逻辑结构是智能创造的蓝本，价值和合是智能创造的目标，两者通过智能道路连通、融合为一。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二）文化价值与四级开拓

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构成了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有序过渡的两个必要环节。借助这两个环节，不仅逻辑结构论得以充实和提升，而且价值和合学也将获得更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合理的逻辑证明。其关系图式如图 11—1。

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作为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到中国文化价值和合学的过渡桥梁，进而从中国文化价值和合学到和合学的四级开拓，作为理解与接受和合学的逻辑阶梯。建构通达和合学理论堂奥的这些理论桥梁与逻辑阶梯，是为了使和合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以超越学科、国别、地域和时代的限制。除了完成两个环节的内涵转换外，尚需完成四个层级的外延开拓。这四级开拓的逻辑流程如图 11—2。

^① 《正名》，见《荀子新注》，367 页。

^② 《系辞上》，见《周易本义》卷三，56 页。